

台灣模式的勝利？

在此次東亞金融危機中，南韓的財閥模式被認為是南韓危機的罪魁禍首，另一方面，台灣的中小企業特色就成了被讚美的對象，也被認為是台灣倖免於難的主要原因。但是這對於危機肇因是否是一個合理的評估？這兩個不同模式未來的發展趨勢又會是如何？

首先，金融危機的導火線是金融問題，而南韓的金融問題惡化的近因其實是不當的金融自由化，是南韓政府在配合的監督制度與相關措施尚未完備之前，就匆促開放所導致的。

確實，南韓大公司的財務向來處於危險均衡，政府也一向將由政府所控制的銀行貸款當作指揮財閥的政策工具，因此給予財閥超比例的貸款支持。不過也是在金融自由化之後，銀行私有化使各財閥取得或設立屬於自己財閥的銀行，於是過去的危險平衡就失去了平衡。

以大財閥這種制度性安排，加上政府的強力干預與對財閥的支持，來推動重化工業，可以說正符合了傳統經濟發展的理論，亦即國家越落後，就越需要強力干預以做為市場制度的替代品。台灣這移民社會在發展資本主義的啟始階段，顯然各種條件都比南韓要好一點，所需的干預也因此強度比較低，也可有比較眾多的中小企業。

當然，以強力干預來追趕先進國，在非常壓縮的時間內去走先進國花了數百年走的路，或許是縮短差距的必要手段，但是落後國家也難免要為此在各方面付出沉重代價，除了財閥所帶來的分配不平均的後果之外，也包括環境、社會各方面的嚴重失衡等。

台灣在戰後的發展模式，其實也是以強力干預來追趕，不過所運用的制度模式不同於南韓，台灣政府主要是用公營企業來擔綱，來推動重化工業，經濟規模龐大的重化工業也向來是各工業國大企業集團的主力，因此台灣私有的集團企業（財閥），在絕對規模以及相對比重上，就遠小於南韓的財閥，同時，中小企業的空間也比較大。

不過，就在眾人正慶幸台灣的處境以及讚美台灣彈性制度的優勢之際，各種的發展趨勢卻都告訴我們，台灣的制度與結構會往南韓模式的方向調整。

一方面來說，台灣集團企業的份量在未來會增加，根據中華徵信所的統計，集團企業在台灣經濟中的比重，在近年來已經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不過更重要的變化還在後面。

現在台灣公營企業私有化（民營化）的政策方針已定，當局已經列出五年內台灣的公營事業民營化的名單與先後次序。譬如說，中油、台電、中華電信等三家重量級公營企業，其資產難以正確估計，不過依據現在（必然嚴重低估的）帳上所列資產價值，加起來也有近兩兆台幣。而 1997 年天下 1000 大製造業與 500 大服務業公司的總資產額為 10 兆，這三家就至少佔了兩成，比重不可謂不高。

這些龐大的公營企業之股份將陸續釋出，這必然將牽涉到財團利益的大規模重組。雖然股權必將分散，但控制權與經營權一定會由少數財團掌握，也就是說，原先佔有台灣產業重大比重的公營企業這部分，將由私有財團以及國民黨黨營企業集團來瓜分。而經營控制權會落入哪些人手中，則會牽涉政治問題了。過去幾個比較小的案子，顯示國民黨黨營企業以及其親近人士可以利用黨政關係掌控一些它們所要的私有化企業。

無論如何，因為這些公營企業的私有化，台灣財團的重要性將會加深，政治地位也會進一步升高。在目前，南韓財閥佔上市公司總資產比重過半，而台灣則是約四分之一，其間差距不小，不過顯然在南韓這比重會受危機的影響而往下調整，而台灣則是相反。

再則，台灣的金融制度保守謹慎，但監督尚嚴，相較於東南亞等國而言，貸款呆帳問題並不嚴重。同時這次危機後，很多國家在制度上受評擊之一，就是很多銀行隸屬於財團，而財團銀行則常涉及利益輸送破壞金融秩序。

在這方面而言，雖然台灣過去銀行多為公營而無此類問題，但是近五年來金融自由化之下，眾多新的私營銀行成立，而其中多數是財團銀行，目前或因其成長受限，或因監督有效，問題並不嚴重，但是結構上的變革已經完成，產生財團銀行弊端的潛在可能性也因此存在。同時，這也是台灣在金融制度方面，清楚的往南韓模式方向調整。

目前而言，因為台灣公營企業私有化過程才剛要開始，所得分配雖在惡化但速度不快，台灣的產業結構競爭性也還算相當高，因此，大家尚未覺得台灣經濟結構調整的趨勢，也仍在慶賀台灣模式的勝利，但是這調整趨勢的方向其實是相當清楚的，台灣其實是在走向南韓的道路，確實，有時慶祝勝利會是下一個危機的開始。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科所研究員）